

多蒙古族人士在微信朋友圈發出蠟燭的圖片，來表達不滿和對蒙古族文化的傷感。

各種流言也伴隨著憤怒而傳播，而壓抑和絕望又讓人們深信這些流言。「現在已經有九個人為了這件事自殺了，昨天又有二連浩特一位女老師跳樓了，我們沒有辦法，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憤怒」，一位元蒙古族男子在微信中寫道。但是任何自殺的消息都未經證實，有的則被官方立即闢謠，二連浩特警方表示的確有一名女子死亡，但是這是刑事案件，並非自殺。

雖然九月中旬內蒙古各地均宣稱學校百分之百的學生復課，但是這件事已經對蒙古族心理產生衝擊波，是近二三十年沒有的，他們對民族文化和國家的認知走向了教改所期待目標的相反一面。「自從這個事情發生以後，我發現周圍蒙古族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家保護學習和保護母音的意識加強了，尤其是那些本來已經不會講蒙古語的家長開始關心孩子的蒙古語教育。一些家長本來對孩子學漢語沒有意見，現在反而有所抵觸了」，包麗穎說。至於因為教改產生的心理裂痕是否會擴大，而政府又會



內蒙古學童：民族特色

採取何種方式來彌補裂痕，都值得拭目以待。

不僅僅是蒙古族，很多漢族知識分子都在微博和微信表達了對強制課改的不滿。一群曾經在內蒙古插隊的老知青也連署了抗議書，抗議書中寫道

民族政策源流

一九四七年，尚未建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區域自治」理論，成立了內蒙古自治區，其地理範圍涵蓋今天內蒙古中部地區。新中國成立後，又合併了民國時代北方九省的蒙古族聚居區，形成了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管轄地域。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化解了民國以來不斷高漲的蒙古民族主義，也使得中共奪取全國政權有了一個穩定的大後方。

五六十年代，中國政府還成立了新疆、寧夏、廣西和西藏四個民族自治區，但是比較而言，內蒙古是經濟最發達、民族關係最穩定的一個，被稱為「模範自治區」。二一九九九年內蒙古人均GDP達到九千八百美元，在中國內地三十一個省級區域中位列第十一名，高於遼寧、湖南、四川等傳統經濟大省。內蒙古幾個資

源發達的城市，比如鄂爾多斯、阿拉善、包頭的人均收入甚至高於北京。中國人均收入最高的三十個城市，有六個在內蒙古，數量全國第一。



胡毅綱：清華教授

馬戎：北大學者

內蒙古的基礎建設也在快速進步。二零二零年初，北京通往呼和浩特的高鐵開通，整個呼和浩特鐵路局每天發往北京的高鐵達六十六車次，年底開通的京濱高鐵路，也特意設立了通往赤峰和通遼的支線，屆時內蒙古絕大多數重要城市都與北京實現三小時內的直達。內蒙古儘管幅員遼闊，人口稀少，但是建立了發達的高速公路網，高速公路和準高速公路通車里程近一萬五千里，村村實現通公路，基礎設施明顯比毗鄰的俄羅斯和蒙古國先進很多。

隨著退耕還草、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內蒙古的森林覆蓋率從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十四增加到二零一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二，荒漠化的草原也有近五千萬畝恢復了植被，內蒙古在近代一百多年來環境惡化的趨勢首度出現逆轉。圖雅故鄉所在的奈曼旗，三分之二的土地屬於科爾沁沙地，過去每逢

春天就黃沙瀰漫，現在沙地上已經覆蓋了一層灌木或稀疏草皮。

基於共同的種族和宗教基礎，蒙古族和漢族的關係也一直很融洽。到去年末，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人口約四百六十六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八。除了少數人口保持傳統的放牧生活方式外，多數蒙古族已經成為農民或城鎮居民，與漢族人雜居。

「像我們社區，既有漢族也有蒙古族，平時看不出區別，大家彼此之間很少有民族之界限」，圖雅說。

漢族人與蒙古人也都保持著通婚的習俗，圖雅的兄弟姊妹四人中，兩個人與蒙古族人結婚，兩個人與漢族結婚。根據一九九零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百分之四十七的蒙古族核心家庭都與漢族有通婚，而同期藏漢通婚率不足百分之五，維漢通婚率不足百分之二，遠比新疆、西藏的通婚比例要高。

民族雜居和融合的結果是漢語越來越成為農區和城鎮蒙古族的通用語言，「我周圍的蒙古族沒有一個不會講漢語的」，圖雅說——她的漢語沒

內蒙民族融合自然

相較於新疆和西藏，內蒙古較好地實現了民族融合，蒙古族對漢族文明接受程度最高，國家認同感也最高。如果按照內蒙古原有的發展軌跡，多數蒙古族青年將像圖雅和包麗穎一樣，以一種自然的方式融入到漢族文明主導的城鎮社會，蒙漢族群的分界線也將會

越來越模糊。

課改之前的少數民族語言教育政策形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這位以開明著稱的前領導人，對少數民族亦有同情尊重之心。他的任內不但給予民族自治區很多自主權，一九八二年新憲法和一九八四年的《民族區域自治法》還特意增加了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條款。法律還規定，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招牌、路標、政府公告等必須雙語並用，並且少數民族語言要置於漢語之前。

然而，進入廿一世紀後，胡耀邦時期的民族政策受到北京大學教授馬戎、清華大學教授胡毅綱等人的質疑，他們認

之子烏傑也曾擔任前包頭市長、山西省副省長。

烏蘭夫之名在蒙古語意思是「紅色之子」，烏蘭夫本人毫無疑問是共產主義者，跟從延安路線。然而，烏蘭夫的形象在海外傾向獨立的學者、行動分子眼中，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著作《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就把烏蘭夫描寫成由始至終追求「民族自決」，以至民族獨立的人物，與烏蘭夫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形象有很大出入，顯示海外傾向獨立的學者、人物在爭奪對烏蘭夫這個「蒙古王」形象的詮釋權。

烏蘭夫家族三代治蒙

烏蘭夫與兒子、孫女皆當上內蒙古領導，影響力巨大。 · 黃宇翔

烏蘭夫（曾用名雲澤、雲時雨）是新中國的開國上將，素有「蒙古王」之稱，家族三代擔任治理內蒙古的高層，是中共高層少有的例子。即便是開國元帥葉劍英家族，選平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號稱「南天王」，但第三代已沒有顯赫高官，惟有烏蘭夫家族歷久不衰，至今對內蒙古自治區仍有強大的影響力。

烏蘭夫是出身土默特旗的

語授課的普通中小學。二零二零年，內蒙古高初中蒙古族考生約四萬多人，但是使用蒙古語試題的僅有一萬二千餘人，也就是說，已經至少七成的蒙古族學生接受漢語授課教育。內蒙古自治區人大二零零七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一九九二年小學一年級蒙古語教材印數為六萬八千五百冊，到零六年則下降為二萬二千五百

冊。「即使政府進行教改的話，我們蒙古族學生的漢語水準也肯定會越來越好，因為這個社會你的漢語不好就沒有出路」，圖雅很堅定地說。

「我爺爺有五個孫輩，但是只有我是蒙古族學校畢業的，其他四個都上了漢語授課的學校」，包麗穎說。生於通遼科左中旗的包麗穎與清朝孝莊皇太后具有某種血緣關係，二零一八年在北京一所非常著名的的大學畢業後，來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雖然她中小學時期接受的是蒙古語教育，但是她的普通話聽起來非常標準，甚至她的名字也看不出蒙古族的痕跡，還給自己取了個英文名字「Cindy」。

日結束後，積極策動內蒙古的自治運動，成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主席、軍事部長，確立了他「蒙古王」的地位。

烏蘭夫雖然在文革早期被打倒，卻在文革中期的一九七二年恢復地位，翌年就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及後更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烏蘭夫在一九七八年去世，長子布赫曾擔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三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



烏蘭夫（左起）、布赫與布小林：三代人統領內蒙

九九三至二零零三年）。布赫之女布小林現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三代都躋身內蒙古最高領導層，但都未擔任過一把手的黨委書記。另外烏蘭夫

為這等於是強化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不利於國家統一，中國應該效法美國、巴西的「大熔爐模式」，通過廢除對少數民族區別對待體系，淡化他們的民族意識，強化國家認同。胡鞍鋼等人把自己的主張稱為「第二代民族政策」，雖然官方在正式檔中從沒有引用過這個概念，但是二零一七年以後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和塑造國家認同觀的教育行動，顯然是跟他們的觀點不同。

不過馬戎、胡鞍鋼的觀點在學術界引起不少爭議。一些人認為中國作為多民族長期共存的國家的歷史，並不同於美國、巴西等新大陸國家，無法完全脫離政治談民族問題，持這種觀點的有中國社科院的郝時遠、王希恩、陳建樾和中山大學的周大鳴等知名民族學家。另外還有不少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也擔心，一旦取消民族區別對待政策，少數民族合法的文化和經濟權利將更難受到保護。

不少專家都表示，中國東部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感和漢語能力要遠勝於新疆和西藏的少數民族，政府應該在統編教材上實行差異政策。「我們以前也一直



內蒙學生：反對當局修訂教學語言

學習中國歷史和政治，雖然用的是從漢語翻譯過來的教材，但是不妨礙我們熱愛中國，難道改用漢語教授，就會讓人更愛國了嗎？」包麗穎充滿疑惑地說，「我覺得這是形式和目的倒置，如果使到人心沒有了，即便都改用漢語教學也沒用的」，她補充道。

生了不少的漣漪。九月十五日，中國外長王毅訪問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時，那裏出現了數百抗議人群，「其實這些人多數是中國的蒙古族留學生」，一位在蒙古國的留學生巴特爾告訴亞洲週刊。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蒙古國約有三萬中國公民，除了一部分華商外，多數是來自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由於蒙古國入學門檻低，中國蒙古族學生很容易拿到學位，並且以「海外留學生」身份在求職和晉升方面獲得便利。這些年蒙古國經濟發展很快，烏蘭巴托迅速成為百萬人口的都市，也吸引相鄰的內蒙古錫林郭勒地區蒙古族前來就業掘金。

巴特爾說：「不過中國的蒙古族對蒙古國的認同感是比較弱的，蒙古國也一直把中國蒙古族當成外國人來看。」由於內蒙古經濟條件遠遠好於蒙古國，並且中國的內蒙古長期是全世界蒙古族的人口和文化重心，所以蒙古國在中國蒙古族心中沒有多少「正統地位」。但是蒙古國在民主化後，開始有意識恢復傳統文化，並宣布二零二五年起全面恢復回鶻文字母，而另一方面中國蒙古族文化受到各種自



內蒙通遼的校門前：警察站崗

然或人為的因素衝擊。巴特爾亦說「這次事件以後，肯定會對這些在烏蘭巴托的中國蒙古族心理產生微妙影響」。王毅訪問烏蘭巴托期間，承諾中國將向蒙古提供七億人民幣（約一億美元）的贈款，並希望雙方「互不干涉內政」。中方贈款是否與此次內蒙古教改有關係尚不清楚，然而，這依然引起蒙古國政壇一些重要人物的關注。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蒙古國民主化重要領導人、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對內蒙古教改的批評，他多次在推特（Twitter）發表言論，並致函中國領導人。額勒貝格道爾吉也是個堅定的蒙古文化民族主義者，他任內在蒙古國恢復了回鶻字母蒙古文，還帶頭夏季回到蒙古包辦公。不過，中國駐蒙古大使柴文睿批評了他的觀點，柴文睿說，額勒貝格道爾吉的觀點完全錯誤，包括內蒙古雙語教育改革在內的一切涉內蒙古事務，都是中國內政，不容他人干涉。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就非常注意施展在蒙古地方的影響力，二戰前，日本曾經希望推動「滿蒙獨立」而肢解中國。在政府大力資助下，二、三十年代日本產生了一大批非常有影響力的蒙古學家，包括和田清、箭內互、江上波夫等，他們也奠定了現代蒙古學的基礎。

日本的影響力 在東京也出現了號稱上千規模的蒙古族抗議人群。日本

冷戰之後，隨著內陸亞洲蘇聯霸權的退卻和中國的對外開放，日本再度重返蒙古高原，把經營在蒙古國和中國內蒙古地區的影響力作為其亞洲大陸外交戰略的重要一部分。蒙古國最重要文化地標，比如世界文化遺產哈拉和林博物館和最大寺廟甘丹寺的修復，都是日本非政府組織援建的。日



蒙古民眾抗議 中國外長王毅到訪：聲援內蒙

美國以蒙古牽制中國 在日本留學。 美國亦把蒙古作為

從背部牽制中國的戰略 抓手，二零一九年美國總統朗普在白宮宣布美蒙之間上升為「戰略夥伴關係」，美國已經

與新疆、西藏不同的是，內蒙古毗鄰中國腹地，其最南部的喀喇沁旗、多倫縣一帶距離北京不足二百公里，內蒙古的不安定將會給中國製造更大的壓力。中國政府是否能及時消除教改引起的不利影響，維護好內蒙古各民族間和平共處局面，避免給蒙古民族主義和國際勢力以機會，讓中國本來就不樂觀的安全環境增添變數，這是教改背後的更深的政治問題。

內人黨冤案的民族傷口

文革期間發生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冤案，逾二萬人死亡。

· 黃宇翔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肅清事件（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九年）是研究內蒙古族群議題難以迴避的題目。按中共官方的數字——一九八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就指出，當時約一百四十萬的蒙古族中有三十四萬六千人被迫害，幾近每戶蒙古家庭都有一人被揪出，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被嚴刑迫害、致殘的則達到八萬人左右，當中絕大部分是蒙古族，被打為「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即便是中共官方的數字，尚且可以看出如此殘酷。



當年標語：反烏蘭夫

居日本、思想傾向蒙獨的蒙古族學者楊海英（日本名：大野旭）的《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他還編著有《騰海清將軍有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等等。

內人黨冤案「對於蒙古族而言毋寧是非常嚴重的歷史傷口，同為一九八零年的起訴書就寫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危害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治權，給各少數民族帶來極大的災難」。當局也意識到事件對民族和諧的破壞，只是把責任都推給了「林、四集團」。「內人黨」冤案本質上是文化大革命在內

獨勢力攻擊中共的重大歷史依據，將事件視為中共作為漢人政權壓迫蒙古人的重大證據，持該意見者最力就是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而在中國內地，則把事件視為「文化大革命」在內蒙古的擴大化，強調是「林彪、四人幫集團」所犯的錯誤，受害者也不單是蒙古族，也包括相當多漢人。

關於事件的死傷人數，各家各派的研究指出的數字頗有不同，迫害致死人數大體在二萬至十萬之間，官方認可的、由內蒙古人民大學學者出版的《內蒙古自治區史》則指死亡人數達二萬七千九百多人，十二萬人致殘。相關的研究還有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而最重要的專著就數旅

蒙古的擴大化，將整個由開國上將烏蘭夫領導的蒙古族精英階層幾乎都打倒了，中國共產黨培育、吸納的蒙古族上層人物一時間都變成階下囚，無疑對蒙古族人民有極大衝擊。

內人黨事件最早的起點就是「五一六通知」之後，華北局召開會議，烏蘭夫被批評，在七月二日他甚至還被劉少奇、鄧小平指責不搞清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隨後被打鬥、軟禁在內蒙古。「內人黨事件」最大的屠夫則是滕海清，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被調任內蒙古代理司令員，展開「挖

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運動，隨後兩年，專案組翻出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展開子虛烏有的整肅「內人黨」，時還「製造」出諸多「新內人黨」的變種組織，如「統一黨」、「民族獨立黨」、「柳條子黨」、「井眼黨」、「沙窩子黨」、「黑虎黨」、「白虎黨」。直到一九七九年，文革結束後三年才正式平反事件，但罪魁禍首滕海清因為過去有戰功，不追究其責任。

「內人黨事件」是海外蒙獨勢力攻擊中共的重大歷史依據，將事件視為中共作為漢人政權壓迫蒙古人的重大證據，持該意見者最力就是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而在中國內地，則把事件視為「文化大革命」在內蒙古的擴大化，強調是「林彪、四人幫集團」所犯的錯誤，受害者也不單是蒙古族，也包括相當多漢人。